



传统私塾的历史变迁

秦玉清

私塾是私家学塾的简称，古代很少把“私”和“塾”两个字直接连起来使用。私塾成为一个社会常用词汇是近代以后的事情，以示与官立或公立新式学堂的区别。古人称私塾为学塾、教馆、书房、书屋、乡塾、家塾，等等，这些字眼都带有几分文雅气或亲情味。私塾学生既有儿童，也有成年人。按照施教程度，人们把私塾分成蒙馆和经馆两类。蒙馆的学生由儿童组成，重在识字；经馆的学生以成年人为主，大多忙于举业。根据私塾的设置情况，清末学部把私塾分为义塾、族塾、家塾和自设馆。义塾带有免费教育的性质，以出身清贫家庭的子弟作为施教对象。族塾依靠族产支撑，属于宗族内部办学。族塾往往设

在宗祠内，不招收外姓儿童。富家大户聘请名师宿儒在家专门教授自己的子女，这种私塾称为家塾。自设馆是塾师自行设馆招生的私塾，不拘姓氏。过去，私塾多为蒙学程度，以自设馆为最多。塾师文化水平悬殊，他们当中既有像蒲松龄、郑板桥那样的文化名人，也有不少粗通文墨的腐儒。

—

作为中国固有的民间办学形式，私塾有悠久的历史。人们一般都认为孔子在家乡曲阜开办的私学即是私塾，孔子是第一个有名的大塾师。

追根溯源，私塾是从更早的塾发展过来的。西周时期，塾只是乡学中

的一种形式。《学记》追述西周的学说说：“古之教者，家有塾、党有庠、术有序、国有学。”当时，学在官府，官师合一，塾的主持人是年老告归的官员，负责在地方推行教化。

最早关于塾的记载不是出自《尚书》，而是出自商代甲骨文。据裘锡圭先生考证，在殷墟出土的卜辞中，有多处提到了塾。塾在卜辞中作“孰”，两个字旁为上下结构。不过，商代的塾不是教育儿童的场所，而是宫门侧之堂。塾是怎么得名的？清人顾震福的解释是：“臣朝君至门外，当就舍更详熟所应对之事。塾之言熟也，是塾本以熟思得名。”（《隶经杂纂》甲编卷下）

先秦时期，孔子只是诸子中的一子，儒家思想没有被作为治国的工具使用。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，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，实行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的文教政策，儒家思想被封建帝王定为一尊，变成了重要的社会统治资源。以传递儒家文化为己任的私塾从此在社会上站住了脚跟，虽历经战乱而绵延不绝。隋唐时期，科举制度的出现推动了私塾的发展。当时，科举考试主要是围绕儒家经典“五经”展开的。明清科举考试的重心向“四书”倾斜，而“四书”同样属于儒家经典的范围。此外，宋明理学家注重对儿童进行伦理教育，并制订乡规民约，推行社会教化活动。宋明理学的兴起，促成了族塾义学的兴盛。历代帝王都把教育儿童看成是家长自己的责任，对蒙学只是略加提

倡、引导而已。官府从不干预私塾办学，任凭私塾在民间自由发展。

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没有中断，长期扮演强势文化的角色，兼之私塾教育的政治、经济基础在古代少有变动，多种因素决定了古代私塾办学的面貌变化不大。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成书于不同朝代（南宋、五代、南朝），它们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，成为明清两代最常见的儿童识字用书。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属于经典读物，这时，也变成蒙学教材的一部分。私塾历来实行个别教学，塾师根据不同人的学习基础、接受能力安排课业，体现了因材施教的原则。私塾对学生背书的要求特别高，读书是私塾学生的主要活动。清代杭州城内著名的宗文义塾在条规中要求学生：“每日读生书，朗读百遍。”

二

对于文化的传递、人才的培养，私塾在古代曾经做出过贡献，它适应了古代社会的需要。但是到了近代，私塾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出现了距离，因此私塾受到社会的质疑。提倡新教育的人指责私塾不开设算术、历史、地理、格致，知识覆盖面过窄；教材长期不变，知识老化问题严重。显然，中国要想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，不能不发展近代新教育。

1901年，清廷下兴学诏，鼓励地方兴学。1903年，“癸卯学制”颁布推行。1905年，科举制度被废除，为

兴学让路。教育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。中国近代工商业非常稚嫩,小农经济无力为普及近代初等教育提供充足的经费,经济滞后制约了近代小学的发展。新中国成立前,儿童在小学的就读率大致为20%。另一方面,社会上还有大量私塾存在。把私塾与小学问题结合起来考虑,有人发现,转化私塾可以作为发展近代初等教育的生长点。1906年,学部向各省转发了江苏士绅提供的《私塾改良会章程》,支持民间组织私塾改良会。1910年,学部颁布《改良私塾章程》,鼓励劝学所对私塾进行改良,调整私塾的课程、教材、教法,促使私塾向近代小学靠拢。20世纪前半期,受政府更迭的影响,近代私塾改良活动时断时续。从全国范围看,大致出现了三次私塾改良高潮:1905~1911年,1915~1920年,1930~1937年。在这几段时间里,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加强对私塾的管理,劝导或者逼迫塾师调整办学方式。

经馆受废科举的直接冲击,纷纷停闭。时间不长,社会上很少再有经馆,剩下的几乎都属于蒙馆。清末民初,义塾、族塾或者改办小学,或者停办。开办家塾属于家庭内部事务,地方政府不便过问。自设馆是最普通的私塾,自然就成了私塾改良的主要对象。据教育部不完全统计,1935年底,全国有私塾101027所,已改良者35394所,未改良者65633所。经过改良的私塾称为改良私塾,办学介于新旧之间,是从传统私塾向近代小学

过渡的教育机构。1915年,商务印书馆为改良私塾设计了一个课程表,其中有修身、国文、算术、读经、体操、游戏。国文、读经采取复式教学形式,其他课则私塾学生合上。1936年,杭州市政府教育科对全市私塾进行常识抽考,发现各塾平时对于常识课都不甚注意。其实,近代的改良私塾大多停留在这样的办学水平上:都开国文(后改为国语)课,不少加授算术;部分采用小学教科书,但没有完全放弃传统蒙学教材。国文、算术需要塾师加以讲解,改良私塾为此添置了黑板、粉笔。

私塾改良遇到一定的社会阻力,本身也有需要检点的地方:对私塾办学的特殊性缺乏考虑。私塾改良收效不大,农村的私塾还是以旧式私塾居多,鲜有改良者。每当私塾改良活动处于低谷,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放松了对私塾的管理时,社会上就会冒出一批私塾来。在军阀混战的20年代以及抗战期间,新开办的私塾比较多。中国古代有私人办学的传统,崇尚文化知识。遇到战乱,官学受到冲击,私学便趁机填补官学被破坏所造成的教育真空。这一模式在近代仍然适用,具体表现为私塾的反弹。

三

新中国成立前夕,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政策,一些私塾的学董因为土地被充公而丧失了聘请塾师的能力。同时,随着对塾师的思想改造工作的进一步深入,部分塾师感到

不再适合设馆谋生，便另图他业。1949年夏秋间，江苏省仪征县对私塾的处理办法有：1. 分区举行塾师甄别试验，合格者发给设塾准许证，不合格者劝其转业。2. 组织塾师学习。3. 组织少数塾师参加冬学研究会和冬学工作，成绩优良的帮助转为公办小学教师。这一年，仪征县有41名塾师转业，主要是回家务农。然而，受战争的影响，不少地方政府无暇顾及整顿私塾的问题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有些县还有私塾存在，多者达数百所；有些县私塾所剩无几，甚至已经完全消失了。教育部根据《共同纲领》的文教政策，把私塾视为一种私立学校，当成了改造的对象。1949年12月，钱俊瑞副部长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示：“对中国人办的私立学校，一般采取保护维持、加强领导、逐步改造的方针。”（《中国教育年鉴（49—81）》）逐步改造和突击消灭的精神是不同的。私塾暂时没有完全取消。1952年9月，教育部指示各地接办私立中小学：“为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人民教育事业，以适应今后国家建设需要，本部已决定自1952年下半年至1954年，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办，改为公立。”（同上）随后，私塾有的被并入小学，有的主动关门。到了50年代后期，私塾基本上在社会上绝迹了。

1964年9月，北京一处偷偷办学的私塾，被公安机关发现后取缔。私塾的主持人当时被定性为“非法开办

私塾，宣扬封建礼教”。

改革开放后，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复苏。80年代初，湖南平江的农村悄然出现了私塾。老塾师朱执中在家中重操旧业，教授乡人读“四书五经”。朱执中让学生读老书、习诗文、练书法，教学因人而异，注重背诵和体悟，这些做法都没有超出传统私塾的范围。不过，朱执中不再体罚学生，比老私塾前进了一步。

近年来，伴随着“国学热”、“读经热”的升温，私塾补习班在社会上应时而生。2005年10月，张志义在苏州开设“菊斋私塾”，刻意追求古典情调。塾师身穿儒士长衫，室内悬挂孔子画像，儿童作揖打躬学习古代礼仪。张志义向学生讲授《弟子规》、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、“四书”、《易经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以及诗词韵文，中间穿插讲授古乐、书画、茶道。张志义是一个国学爱好者，“菊斋私塾”的办学宗旨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，它与传统私塾的精神是一致的，尽管具体表现形式有所不同。

私塾重返教育舞台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。人们把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私塾叫现代私塾，即现代社会中的私塾。现代私塾在小学教育的缝隙中产生，它试图补充小学教育的不足，利用了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好奇心。不过，新旧教育观念的跨度太大，而且，现代私塾还要承受来自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压力。这些因素都制约着现代私塾的发展。

（作者单位：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）